

中国古典美学“游”范畴探源

薛显超

【提要】“游”来自原始先民对于星体运行的观察，作为旗帜飘带的“游”象征着星与命，具有沟通天人的作用。旗帜在祭祀和战争中的重要功能强烈地影响了原始先民的思想意识；同时，“游”又是原始先民对于现实生活观察、体认的结果。魏晋后“游”沿着虚化与诗化的轨迹，深入影响了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代表生命与审美最高境界的重要范畴。

【关键词】游 旗帜 祭祀 战争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3-0098-05

一、“游”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

“游”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唐君毅将“游”视为中国的艺术精神。他说：“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凡可游者之伟大与高卓亦即可使人之精神涵育于其中，而藏焉、息焉、修焉、游焉及至真美之所在。”^①唐君毅还分别从音乐、书法、建筑、绘画等多个角度来论证，认为这种“游”来源于虚实相涵，他说：“凡虚实相涵者皆可游，而凡可游者，必有实有虚，一往质实或一往表现无力量者，皆不可游。瀑布大海，高山峻岭，高耸之教堂与金字塔，皆美之可观，可赏，可赞美者，而不可游者，以其皆缺虚灵处也，故吾人谓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可游，亦可改谓中国艺术精神在虚实相涵，虚实相涵而可游，可游之美乃回环往复悠扬之美，又谓‘飘带精神’。”^②这种“游”在唐君毅看来象征着绝对自由与本质超越。徐复观在谈到庄子的时候认为：“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至乐’、‘天乐’；而至乐、天乐的真实内容，乃是在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庄子把上述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实

即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③徐复观甚至认为正是在这种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上，中西方哲学、美学才有了相遇的可能。

朱良志也将“游”、“清”和“悟”看作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要素。他说：“‘游’的心态为‘悟’的审美思维方式提供了宽广的心灵空间和深厚的精神、情感动力。‘游’的思想对于艺术首先要求主体自我解脱，从主体内部获得心灵的自由飘飞，最大限度的释放主体精神能量。”^④他认为“清”是和“道”、“自然”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不管其作为一种人格理想，或是美学追求都是和“游”脱不了关系的。“清”和“游”有共同的“道”的基础，同时“清”代表着一种非功利的距离，得其神韵，不粘不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亦可以“游”，可以“清”。执着的关注必然导致静态事物的描摹及色彩的绚烂浓烈，只有“游”才能取物之神达到平淡为美的境界，以清新、清淡包孕一切至味。“悟”从宗教中来，带有明显的超越性和指向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明白过来，而是一种人生观的转变，是一种对现实

①②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6~307页。

③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7页。

④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人生非本真，非诗意状态的反驳。就这种超越性而言，“游”与“悟”是相同的，都是内在诗意的超越。在操作上都是一种现量直观，不依逻辑判断的诗性的方式；在指向上，“游”与“悟”同样是一种审美或人生至境，然而“游”似乎更具根本性，“游”而能“悟”，“游”可以同时是目的和结果，而“悟”只能作为终极目的的存在，这样“游”就成为了“悟”与“清”的前提，具有了根本性范畴的地位。

“游”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存在，诸如“游泳”、“优游”、“巡游”、“游戏”、“游方”等词语至今仍活在现代汉语当中；儒、释、道三家都有关于“游”的重要表述；历代诗文中都有“游”的体现和言说。《诗经·邶风·谷风》中有“泳之游之”，^①《小雅·采芣》有“优哉游哉”，^②《齐风·载驱》有“鲁道有荡，齐子游敖。”^③《尚书·五子之歌》有“盘游无度”，^④《离骚》有“忽返顾已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⑤文论中有陆机的“心游万仞，神驰八荒”，刘勰的“神与物游”，郝经的“内游说”，李渔的“梦往神游”、及“天游”、“游道”、“善游”等诸多重要命题，并体现出身体、视角、心灵等丰富的层次。

在古典美学领域，以“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数量可观的范畴群，其强大的理论活力表现在审美活动与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游”与游意识隐约构成了一种代表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苏秉琦认为这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精神“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⑥列维·布留尔也认为：“语言受制于一种集体表象，语言虽看似是存在于操这语言的个人意识之中，然而他仍然是以集体表象的总和为基础的无可争辩的社会现实，因为它强加给这些个体的每一个。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这些社会集体中的全部成员共有的特征，世代相传，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⑦

前人已经认识到“游”的丰富内涵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没能从传统文化哲学的整体出发，存在着把“游”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具体范畴的弊端，“游”的来源、内涵、演变等远没有被挖掘清楚。这种缺憾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各家论“游”多以庄子的“游”作为起点。这大概基于以下两种考虑：首先，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或者文论的范畴，大多自哲学范畴流衍而来，古代文论范畴中重要的或者带有元范畴性质的范畴莫不如此，如道、神、气、自然等；其次，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郭绍虞认为“道家虽不主文，但其论道近于艺，其精微处颇能攫得纯艺术的神秘性。”^⑧故而对文学影响深远。但还是有所缺憾，庄子的“游”并不是游的源头，范畴研究要想突破自身瓶颈，必须返本以开新；而“返本就是要完成对经典文本原初意义的重新把握”。^⑨通过对

“游”的梳理我们感觉到，这些以“游”为核心的范畴虽然形态各异，层次多样，却都带有“游”的原始胎记。因此，为了厘清“游”的复杂含义及历史演变过程，并进而把握其精神实质，就必须对“游”进行历史还原。相信对“游”进行溯源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游”范畴的审美意蕴与流变。

二、“游”与旗：“游”的神圣来源

许慎《说文解字》说：“游，旌旗之旒也”，^⑩“游”与“旒”同。《段注》云：“又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游。”^⑪《广雅·释诂三》：“游，戏也”。徐复观认为：“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拘束，故引申为游戏之游。”^⑫这样推导是有一定道理的，唐君毅也把古希腊女神的飘带引申为带有自由、游戏意味的“飘带精神”。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得出结论的过程太过模糊，如果根据“游”旗帜飘带的来源就引申为自由、超越或者直接拉向“游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他们把“游”这样一个旗帜的附属品为何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及文化生活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旗帜飘带如何转化为自由这样一个抽象意义的原因和过程完全忽略掉了。只把这种原因和过程看作是不证自明当作人所共知的事实来接受是不够客观严谨的，同时这种“六经注我”的思路也抹煞了“游”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这种飘带绝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绝对不是因为美观而被单纯作为装饰来使用的。事实证明很多我们过去附会为原始人美感因素的饰物都有着更为神圣的因素。同样的，“游”作为旗帜的飘带，也有着更加神圣的内涵，“游”对于人的影响应当是与旗帜的来源及作用分不开的。

①②③④ 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902、354、176页。

⑤ 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⑥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⑦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页。

⑧ 郭绍虞：《郭绍虞说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⑨ 党圣元：《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⑩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⑪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⑫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旗帜产生的年代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它来源于原始图腾，或者它本身就是图腾标志。旗帜上通常描绘图腾标志，“旋图画龟蛇，旗图画熊虎，族图画鹰集，族装饰鸟羽，分别代表了虫图腾集团、兽图腾集团以及鸟图腾集团的文化习惯。”^①旗帜在具体类型上，有移动和固定两类，移动的旗帜是固定旗帜的变形。

（一）固定的旗：从图腾到礼器

固定的旗帜是原始社会“立中”观念的产物，是“中杆”的发展和变形。原始氏族由于生存环境恶劣等原因，氏族房屋在建设上是有规律的，经常很多大房子围绕成为一个圆形，中央留有一个空地。这个中央空地不仅是氏族集会议事的场所，更是宗教祭祀的场所。七千年前大地湾的庙堂、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姜寨的中央空地、六千年前辽宁红山牛河梁的祭坛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张法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地上统一的“中”应该是缘于原始人对天上的恒星区的体认。中央空地上常立杆，用以观察天象和测影，恒定不变的东西是天上的北极和地上的标杆。以所立之中为基点，观察范围就是整个天体宇宙，于是就产生了中国人最初的整体宇宙观。^②这个柱（杆）上要么是雕刻绘画图腾形象，要么就是挂图腾旗帜。大地湾901号房前有柱子可以挂旗，半坡氏族有羊角柱，良渚文化有鸟柱。^③从“中”的原始字形来看，它本身就是旗帜，而且是有飘带的旗帜。

随着周代理性精神的觉醒，祖先崇拜逐渐取代了图腾崇拜，神转化为天，礼乐文化成为主流。礼作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旗帜这时候作为礼器出现在各种场合，在我国两周时代，围绕着旗帜类礼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当重要的礼制内容，在《周礼》中，对此类礼制的介绍是比较具体的。^④《周礼·春官》也有仪式上在饗上插旗的记载。至今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还都有在神器上或祭祀场所缀飘带形装饰物的习惯。两周时期专门设立一个司常负责旗帜方面的礼仪，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移动的旗：从采集到战争

移动的旗帜是固定旗帜的变形。这类旗主要起氏族标志和行动中的指挥协调作用。

首先，在从事原始采集活动时，旗帜起标识、引导的作用。旗帜使人在旷野之中迅速辨识本部所在。这种方式在现代仍有残留，在修建工事或团体旅游等集体活动中都要有此类旗帜引导。龚鹏程引用白川静的说法认为：“打旗出游是氏族迁居现象，奉神出游，而真正能游者只有神，故是神游的来源。”^⑤此种说法似有道理，但是旁证较少，我们更显而易见的还是旗帜在战争中的作用。

其次，用于军事战争。狩猎采集时的标识引导功能最终转化为战争中的指挥协调功能。“凡军事，建旌旗。”^⑥由于残酷的地缘环境，各部族之间征战不断。阪泉之战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战争，《列子·黄帝篇》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貔、狼、豹、貔、虎为前驱，鸛、鷩、鹰、鸇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也。”^⑦这说明旗帜几乎与战争同步。《周礼·春官·司常》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的九旗，即常、旂、旃、物、旗、旛、旆、旟、旌。^⑧这些旗帜在等级社会就成为了身份等级的象征，“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旛，县鄙建旐，道车载旟，游车载旌。”^⑨另外，与原始氏族的旗帜一样，这些旗也配有装饰物即旒（旒又作旒，即飘带）。

孔颖达说“旌之旗旒皆仿其星”，而星数又与命数相关。^⑩这样，人与星（天）之间的关系就通过旒（飘带）体现出来。汉字“天”就是人在“一”下，这个“一”就是统一的天。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占星术，通过一种互渗思维，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的人世活动联系起来，这在很多民族都曾存在，即使以实录精神著名的《史记》中，也记载有大量的关于星象和人事直接相关的实例。不仅如此，星星在天上的运动干脆就被称作“游”：《文韬》云“极星与天俱游，则天极不游。”《抱朴子》云“极星绕极四游”。《尚书·考灵曜》云“春星西游，夏星北游，秋星东游，东星南游。”

这些都是古代文献中关于“游”和星体之间神秘联系的例证。

三、“游”与生存样态

（一）“游”与生活环境

“游”不但来自于对旗帜的神性体验，而且来自于生活现实的体认。原始文明大多依托大河发展，水是农

① 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② 张法：《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③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④ 张岩：《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⑤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⑥⑨⑩ 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32~733、544页。

⑦⑧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31页。

业、畜牧业发展的必要保证，世界各大原始文明都发源于大河流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我国，黄河、长江是华夏文明发源的主干，即使是一些稍微边缘的文明发源地，也无不具有依水的共同特征。“从元谋盆地，蓝田人居住的灞河谷地，到北京人居住的周口店、马坝人居住的滑石山盆地，到北京猿人同一地点的具有仪式出现的山顶洞人，到炎黄黄帝时代仰韶文化的关中地区，到周代以后历代都城选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环山临水。”^① 河流的蜿蜒走势，曲曲折折的形态十分类似于飘动的旒，我们常以帛或练等丝织物来比喻河水，如“澄江净如练”。所以“游”被用作河流的一段，“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② 水里的运动被称为游泳。通过对世界的朴素观察和想象，华夏民族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陆地是浮于水上的洲，太阳、月亮从海里升起落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③ 人死后要下黄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邹衍有“大九州”之说，洲就是水上的浮地，陆地既然是浮动的，就不是固定而是游走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人们对“游”的意识和观念。

（二）“游”与生存状态

就生存状态来说，在古代社会，整个人生由于主动或被动的的原因都处于游走的状态。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试图从社会结构形态来分析中国农村，描绘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农业文明国度：乡土观念浓厚，家族关系深厚，重视血缘和地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自不免亦有偏”的一家之言，孰料竟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以致成为而后社会学分析中国文化特征时常用的模型。台湾学者龚鹏程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费氏这种对抗战时期农村的考察不能成为中国广阔地域和漫长历史的代表。中国古代是一个游的社会，非游只是暂时的，游才是社会和人生的常态”。^④ 单就被动而游的方面来说，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是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从公元前 18 世纪的商朝时期开始，至汉朝末年，中国凡发生自然灾害 477 次。其中商朝 13 次，西周 89 次，秦汉 375 次。另外，宁可在《汉代农业生产漫谈》指出，先秦大约 12 年中就有两个灾年，占 16.6%。从吕后至新莽末年 210 年间，有 52 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度的 25.8%……”。战争和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游民。汪康年《汪镗卿笔记》卷 4 有条杂记说：“凡游民号走江湖者有八种，系九经、十八皮、四李、三瓜、七风、八火、五除、六妖。”分类之详细可见游民之众。政府迁徙也是原因之一：《清稗类钞乞丐类》中记载“光绪时，吏奏请移民实边。于是湖北之兴国州有贫民数万，挈其妻孥，（至黑龙江）”^⑤ 这是实际存在的。

另一方面，历代对游民的禁绝令和统治者对游民

的贬斥态度也可以看出人口流动的事实。我国从周初就开始施行编户齐民政策，《礼记·王制》称：“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故曰：无旷土，无游民”。^⑥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都为自己国民的减少而忧心忡忡。由此可见，“游”乃是社会和人生的常态。这种“游”的状态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念的价值形态。王学泰认为：“游民与知识分子结合就会产生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约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⑦ 闻一多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一个道，一个土匪。”^⑧ “匪”本身就是一种游民无产者。这里三教九流皆备，游意识形成了以关帝为崇拜对象的江湖文化，可以说关帝崇拜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游民传统，这对中国社会的治乱及民间通俗文学都影响甚深。

综上所述，旗帜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占有重要地位，人与神的关系通过旗帜建立起来，到先秦理性时代，旗帜又关系人与礼，其作用和地位不可低估。“旒”作为旗帜上的飘带，是关联星数（天）与命数（人）的中介，必然会具有实实在在的神性，这种神性到理性时代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并转化为服饰上“旒”的区格作用。在互渗律的支配下，这些伴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的神性因素必然作为一种集体表像留存下来，形成文化的积淀，在一代一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真切的现实体验则加深、强化了这种游意识。这种游意识渗透到思维结构、精神领域，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成为华夏民族心理积淀的一部分。“旒”与“游”、“由”音同意通，旗帜飘动的形态，星辰运行的轨迹，氏族迁居打旗出游所走的路线，河流的走向具备着某种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游”的自由内涵借此凸现出来。“游”本身的复杂性也初步显现出来。彘旁“游”更注重形体，但是由于奉神出游的神性因素，也

① 张法：《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 页。

③ 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0～181 页。

④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03 页。

⑥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1 页。

⑦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⑧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79 页。

使他具备了自由、超越的内涵；水旁的“游”更注重自由自在，而两者在自由超越意义上又实现了会通，所以后世常通用。这里“游”本身的复杂性也成为后世“游”表现形态多样和含义丰富的原因。“游”在思想中，就是神游、卧游、游仙，到彼岸世界作精神的游历；在现实中，就是旅游、游荡，进入与殿堂相对的江湖。

四、“游”与“遊”

我们还有必要区分“游”与“遊”。商承祚认为游：“从子执旗，全为象形。从水者后来所加，于是变象形为形声矣。”^①从水的意思主要有：1. 水中浮行。《诗经·邶风·谷风》：“就其浅矣，泳之游之”。2. 流动、飘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虚浮不实。《易传·系辞下》：“诬善之人其辞游。”游泳、游戏、游艺、游冶等词义由此而来。从辵的意思主要有：1. 遨遊。通游。《尚书·大禹谟》：“罔遊于逸，罔淫于乐。”2. 乐。《孟子·梁惠王下》：“夏谚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3. 行走。《礼记·曲礼上》：“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游历、游方、游牧、游仙等词义由此而来。很明显的，浮行为游，行走为遊。但两字音同意通，古籍中往往互相通用，但是浑言则同，析言则别，与水有关的仍作游。与水的特质相关，又衍生出虚浮不实、含润侵泳等含义，如“依于仁，游于艺”。行走层面在古代典籍中则多写作“遊”，如《庄子》33篇多作遊，《论语》之“乐佚遊”等。

五、结语

我们把“游”放到传统文化哲学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视美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学术

为一个整体，综合利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运用文献考证、文化分析的方法对“游”的原初意义进行研究。发现了“游”作为旗帜飘带沟通天人的作用，又因为旗帜在祭司和战争中的重要功能而强烈的影响了先民的思想意识。同时，“游”又是原始先民对于现实生活观察、体认的结果。对后世影响重大的儒、释、道关于“游”的言说无不生发于此二者。魏晋后“游”沿着虚化与诗化的路线，深入影响了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代表生命与审美最高境界，具有自由与超越品格的重要范畴。

[导师党圣元教授点评]

薛显超同学的《中国古典美学“游”范畴探源》一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美学中的重要范畴“游”。论文把“游”放到传统文化、哲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视美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学术为一个整体，综合利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运用文献考证、文化分析的方法，对“游”之本源及其文论、美学义理进行了深入而缜密的考辨。论文学术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资料翔实，考辨深入，阐释到位，是一篇体现了较好的学术素养的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因而郑重推荐之。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商承祚：《殷墟文字》，转引自鲍汉祖《石鼓笺释》，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 页。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You as a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 Category

Xue Xianchao

Abstract: Firstly, You came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ancient people on star running. It referred to the streamer of the banner, which symbolized the star and destiny, and worked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God and human. For the banner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acrifice ceremony and war, it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thoughts of ancient people. Secondly, You was the result of the observation and cognition towards real life of ancient people.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y, along the track of virtual and poetic, You affect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deepl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ategory on behalf of life and aesthetic.

Key words: You; banner; sacrifice; war